

新闻丛谈

徐铸成



浙江人民出版社

新闻丛谈

徐 铸 成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刘乙秀

新闻丛谈

徐铸成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50,000 印数00,001—13,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7103·1284 定 价：0.59 元

前 言

这几年，我写了一百多万字，已成书六册，先后在海内外出版。朋友们说，我是老树开花，晚年倒进入写作的旺盛期了。

其实，这是“实逼处此”。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赶快动笔写出来，这是早年养成的职业习惯。特别在主持“笔政”的二十年（1938—1957年），每星期大约写三篇社论，加上短评和其他文章，一年也要写上几十万字。忽然被迫搁笔，憋了二十年。一旦阴霾扫去，天朗气清，就感到精神舒畅，急于握管，仿佛久已息影的老艺人重回舞台，激情难抑，急于放声歌唱，重新练功，虽然日近桑榆，喉咙干了，身子骨也发硬了。

重新“登场”，是在1978年秋，香港《文汇报》创刊三十周年。作为创始人之一，我写了《三十年前》。从此以后，一发难收，接连写了一组旧闻、掌故——以后收入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旧闻杂忆》正续篇（四川人民出版社印有国内版）。

1979年起，每年大约发表三十万字，写作的劲头越来越大，象二十几万字的《报海旧闻》，是在盛夏中一面挥汗，一面伏在斗室的吃饭小桌上写成的。蒙广大读者的厚爱，这就象看了多年的“样板戏”，“换换耳音”，重新听听老腔老调，反而感到新鲜。而更重要的，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讲求实事求是，国家兴旺发达，百废俱兴的新气象，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去日苦长，来日苦短，毕竟是七十七岁的人了，自己也有一个“争时间、抢速度”的紧迫感。今年，又应浙江人民出版社友人的邀约，来西湖小住，漫步孤山、白堤，远眺六桥、三竺，简

徉于人间天堂，看四周景物，就象是雾里看花，醉中赏月，比之去年，视力显有退步，老年白内障又有所发展了。尽管朋友们夸奖我记忆力还很管用，我自己心中是有数的，本来有些记得很清楚的事情，现在有些模糊了，原来很熟悉的人物，声音笑貌如在眼前，而名字竟一时记不起了，必待清夜梦醒，再三回忆，才又从记忆里跳出来。这就使我恍然悟到，人们的大脑皮层，大概也象筛子一样，年纪愈大，网孔也愈疏，原已明明白白的东西，由细到粗，逐渐被筛漏掉了。这也使我进一步理解了鲁迅在病中的一句名言：“就是这样吧——但要赶快做。”

生逢盛世，精神舒畅，照我的健康情况，再写作十年，大概是没什么问题的。党的十二大以后，我自己订了一个“五年计划”，先把旧经验、老掌故的清理告一段落，然后着手写传记文学《张季鸾先生传》（暂名）。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从辛亥革命前的《民立报》起，一生执着新闻工作，威武不屈，贫贱不移，无论采访、编辑，都有创造性的贡献，新闻评论尤其出色，开一代之文风。把这位前辈的一生，如实地写出来，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旧社会三十多年的情况和近代中国新闻界的沿革。此外，我还承担了约定，准备编写新的《民国演义》。我的学生贺越明君，近年潜心报刊史的研究，花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翻阅旧报，就便整理我以前写的评论及其他文稿，认为有不少还可以供后学浏览的东西，如果选一部分付梓，也要花工夫，作些必要的注释，介绍些当时当地的背景材料和写作的构思。完成这些工作，不是很轻松的。

去年写的东西及演讲记录稿，约有十几万字，配以旧作，又可以成书了。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帮助，加以抄录、整理和编次，并愿意出版。

这本拙著，和前已出版的有所不同，题材扩大了，内容也许更芜杂了。

我在《文汇报》工作二十年（不算1980年起重回老家，担任顾问），别人的评价如何且不论，就我自己的回忆和体会来说，解放战争时期那一段以及1956年10月起复刊那一段，自以为全神贯注，花精力最多，创造性也最多，可说是两个“黄金时代”。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紧接《报海旧闻》，追叙我在香港、桂林、重庆、上海的经历、见闻，以及由《大公报》重回《文汇报》的经过，直至1957年搁笔为止。可惜第一个“黄金时代”因无力翻阅旧报，未能详细叙述，只能凭记忆写出个梗概。至于第二个“黄金时代”，现在似乎还不宜细写，留待历史去评议吧。

第二部分，主要谈的是进一步改进新闻工作的意见。我非常同意一位领导同志说的话：我们过去生搬了别国的一套模式，走了不少弯路，经济建设如此，其他工作恐怕也不例外。现在，新闻工作也开始要打开新局面，以进一步适应建设两个文明、振兴中华的需要。究竟如何革新，使现有的新闻传播工具，改进成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众传播宣传机构，我因为长期脱离实践，无权发言，只能根据老经验探讨新闻写作、编辑等技巧艺术问题。中心思想是从经济工作得到启发的。三中全会以来，整顿、改革，抓住一个中心环节，就是挤干水分，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得到了这几年的稳步发展，开始“起飞”。我想，我们的新闻工作，不也有一个讲求宣传实效的问题么？凡是大众传播，对受传者都没有强制性和约束性，要有吸引力、说服力进而有感染力，才能使受者喜闻乐见，坚信不疑，受传后还能很自然地产生鼓舞行动的力量。这就要从采访和写作手法以及编辑加工、组织评论各方面，注意一系列的技巧或艺术问题。好比烧菜，“原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是立场、观点等本质问题，至于如何进行加工、调味，做得色、香、味都好，使“顾客”“垂涎欲滴”，大“啖”细品以后，感到满足、兴奋，回味无穷，就有一个技巧问题。我给这些技巧，

形象地“发明”了一个概括的名称：新闻烹调学。钱伟长同志见了，给我改为新闻艺术。

最后一篇，主要是对出版工作者讲的。因为我在被贬谪期间，曾在出版界挂籍二十一年（1959—1980），年数也不算少。最初是在上海市出版局审读处工作，审阅有关教育、历史出版物，在局长罗竹风同志的关切下，颇有乐不思蜀（新闻旧业）之感。罗还推荐我参加修订《辞海》近、现代史部分的选辞和释文工作，我也尽力而为。不想“好景”不长，竹风同志也被文痞姚文元“咬”住不放，旋又被点名批判。那时，受“左”的思潮影响，要对上层建筑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砂子”，自然，光把“砂子”掺进去还不行，得把“泥土”剔出来，于是，出版界成立了一个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把各出版单位剔出的“泥土”集中起来，加以“利用、限制、改造”。我自然也是泥土之一。1964年被运去归堆，参加《申报》的翻印筹备，并让我主持编目索引（因为早期《申报》的重要新闻，只分“本报专电”、“外电”等栏目，没有标题，不便于查考）。

不到一年，“史无前例”的号角吹响了，大字报铺天盖地，接着是破四旧、大揭发、大批判，又有工宣队进驻，掺进的不是砂子，是石头了。真是飞“砂”走“石”，大地一片红尘，泥土自然任人践踏。后来，又下乡，入干校，接受“再教育”历四年之久，1973年才被调到《辞海》编辑所，控制使用，直至“四害”消灭，“凡是”澄清，才被调回新闻本行。二十一年，实际学干出版工作不到十年，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或心得体会，好在新闻和出版是近邻，有很多共同点，我只能谈谈干这工作的甘苦和如何提高自我修养、如何自学成才等问题。

还有些有关史实的材料，也一起编入。

不纯粹是追忆新闻界的往事了，因取名曰《新闻丛谈》。

1983年5月1日写于西子湖畔

目 录

记范旭东	1
竞争与互助	13
桂林杂忆	16
李宗仁与新桂系	36
两过贵阳	41
一位隐名的来访者	54
一个志同道合的战斗集体	64
周恩来同志对《文汇报》的关怀	71
真诚的人 真诚的书	76
《文汇报》第二次被封前后	83
香港《文汇报》创刊初期	88
劫余日记抄之一	94
一组被腰斩的访问记	121
香港见闻	128

漫谈新闻和新闻评论	143
我是怎样开始写新闻评论的	147
新闻烹调学	152
怎样提高宣传效果	165
时间——新闻现代化的尺度	172
自强不息，勇攀高峰	178

记 范 旭 东

——兼谈香港沦陷与
《大公报》休刊经过

(一)

1884年，发生了中法战争。从此，西方“列强”在古老的中国身上，进一步划分势力范围，强行宰割。全国人民陷于豆剖、瓜分之惧。

那年，湖南湘阴县一个姓范的穷书生家中，又添了个儿子，取名锐，字旭东。这个穷书生，是靠坐馆——当私塾老师为生的。大儿子叫源廉，字静生，虚龄已九岁，很聪明，在父亲的督教下，文章已能成篇。但从生了老二后，家中多了一口，生计更加艰苦。范旭东五岁那年，父母先后去世，哥哥抚养他，教他识字。那时，这个十四岁的哥哥，已入学成了秀才，在长沙岳麓书院攻读，每月有二两“膏火金”。他把弟弟接到长沙，租赁半间草房，勉强维持饱一顿饿一顿的生活。每到寒冬腊月，破被无温，哥哥常把幼弟拥在胸口，度过寒夜。

到1897年，梁启超从上海到长沙，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提倡“西学”，讲维新富强的道理，年轻学子，趋之若鹜。范源廉也报名进了这个学堂。他虚龄已二十二岁，只比梁小三岁，但执礼甚恭，学习成绩优秀，深得梁的喜爱。此时，范旭东也已十三岁，能够读懂哥哥带回家的讲义和笔记，在幼小的心灵里开始萌发爱国救国的思想。

没有几个月，梁遭到保守派王先谦等的激烈攻击，在长沙存身不得。临去时，向陈宝箴推荐时务学堂几个他最得意的门生，陈即以官费送他们东渡留学，范源廉亦在其列。留下一个少年的兄弟，托同学好友照顾。

范源廉到东京后不久，戊戌政变失败。他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认为要救祖国，应从开学校、“迪民智”入手。他先进了东京的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一年毕业后，又进日本政法大学深造。他生活节俭，一年中，从官费中节余了一二十两银子，托朋友把兄弟带到日本，读了一年日文补习学校，也考取了大学，入预备科。从此哥哥的一份官费分一半给弟弟节约花用。兄弟却另有见解，认为救国要靠科学，因此学的是理化科。

哥哥于1906年学成归国，先任学部参事，旋改任新成立的清华学堂校长，继续接济兄弟在日攻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范源廉任教育部次长。范旭东也学成归国，在临时政府财政部任秘书。

袁世凯当国后，兄弟两个都不愿到北京做官，静生先生应聘到刚成立的中华书局任编辑所长，旭东先生则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以少量资金，于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久大盐业公司，以抵制日本在我国倾销的精盐。

1916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自称洪宪皇帝，静生参加了讨袁的“护国之役”，任护国军政府驻沪代表。袁失败后，静生随他的老师梁启超到北京从政，曾先后任教育总长和内务总长，并曾赴美考察教育。他在教育界深得人心，声望仅次于蔡子民（元培）先生。1922年弃官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6年该校扩大改组，成立了我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静生先生续任校长。擘划伊始，积劳成疾，翌年病逝，年仅五十一岁。那年，我刚由清华转学师大，半工半读，开始跨进新闻界的大门。全校师生集资修建“范静生校长纪念碑”，上有半

身像，我曾参加了揭幕仪式。

1929年，我调任天津《大公报》编辑，那年冬天，曾去塘沽。那时旭东先生的久大盐业公司已大大扩充，另成立了永利制碱工厂，延请我国著名工程师侯德榜任总工程师。除制碱外，兼制造硝酸、硫酸等化工产品。听说德国的“卜内门”公司（正在我国大力推销肥田粉）曾几次企图以高价收买或加股，均遭旭东先生严词拒绝。

“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在浦口附近筹创大规模的化工公司。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敌军侵占平津，曾一再诱胁，企图以“合作”的名义吞并塘沽的“永、久、黄”——久大、永利外，早已成立一黄海化学研究所。旭东先生大义凛然，宁为玉碎，千方百计将机器设备运入四川，在五洞桥附近筹建新厂，不久就生产出化工产品，为抗战提供重要的军火原料。

1940年他与美国某化工机械公司签订草约，订了几部新式的机器，他偕侯德榜一起赴美参观并商订新购机器的项目。

经过初步洽商后，范旭东先生要求参观该公司。这个公司早知道侯德榜先生是中国最有名的化学工程师，以为旭东先生不过是一位企业家，所以提出条件，只准范先生一个人参观，不准侯先生陪同。以为这样，他们的业务机密便可以保住，不致被“偷走”。侯先生衣着朴素，恂恂如一“乡巴佬”，到美以后又深居简出，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他们两位约定，由侯先生假扮为范旭东先生的侍役，一同去参观，默记所有机器的主要部分和先进的部件。这样，到约定的那天，两人去工厂尽可能观光了一遍。归旅舍后，两人各就所得，记下了数据，草出一份草图。旭东先生为着资金等问题要向该公司重要股东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商量，提前偕其夫人去香港，侯德榜先生还有事要多留几日，相约回国后即互相对照参观时的所得，以便尽可能改进旧机器，少进口新机械，努力改进和扩大产品。

他们夫妇是1941年12月16日晚抵港的，想不到第二天深晚日军突袭珍珠港，第三天清晨即围攻香港，他们陷身在炮火纷飞的危岛之中。

(二)

四十年代的香港，市面远不及上海繁庶。主要的热闹马路只有两条——皇后大道和德辅道。滨海还有一条干诺道，那主要是码头、客棧、酒店、海关和邮局等集中的地方。德辅道有不少高层建筑，大银行、大洋行、大酒店、大百货公司如先施、永安、大新，多半集中在这条马路上。香港的有轨电车——英式双层的——几条线路都从这里出发。金城银行香港分行也设在这里，是一幢六七层高的“石屎”（水泥）大厦，建筑很坚固，是当时比较高的大厦之一。

太平洋大战爆发后，日军很轻易地占领新界——就是1997年将满期的九龙扩大的租借地。为了迫使香港英国当局投降，日军昼夜不断向香港炮击，偶尔还派少数飞机轰炸，加重了香港的恐怖空气。

金城银行的地下室变成了临时的防空招待所，范旭东夫妇和经济学家何廉都被周作民邀请住在这里。《大公报》的总经理胡政之也是周的多年好友，他本已移家桂林，亲自主持《大公报》桂林版。从张季鸾死（1941年9月）后，他补上了国民参政员，不时要去渝参加活动。那年11月，国民参政会刚开完一次大会，胡政之为了添置一些桂林馆需要的器材，会毕即飞港，也陷在炮火中，被招待住在金城的地下室里。

一天上午，我去探望胡先生。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妇，男的五十多岁，中等身材，面清癯，双目却炯炯有神，穿着一套半旧的西装。经胡先生介绍，我才首次认识这位慕名已久的范旭东先

生。他的湖南口音很浓重，但说话很热情，不断问我收听到的太平洋大战发生后国际的新局势。同时我也认识了何廉，他却沉默寡言，似乎对处境忧虑重重。

到了12月12日，日军已全部占领九龙半岛，海面的交通断绝了，听说日军司令部已向香港总督致了严厉照会，限期无条件投降。香港各报经过相互协议，一致决定停刊，13日晨出版了最后一期。我在《大公报》的终刊号上写了一篇《暂别读者》的社评，指出香港不久势将易手，但分析形势，展望前途，日军终必溃败，希望在今后的黑暗岁月中与读者互勉，尽力保持民族气节，将来重新见面时大家不内疚，不脸红。还引用了文天祥《过伶仃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结。

那天晚上，日军的炮火特别密集、频繁，德辅道、干诺道一些大建筑尤为集矢之的。我们的集体宿舍在半山的罗便臣道，是租用一位南洋华侨建造的五层楼，那夜顶楼也中了一枚不大的炮弹，楼梯口的玻璃窗全被震得粉碎。

清晨，我冒着不时从头顶“噻噻”而过的炮弹，下山去慰问胡政之先生和范旭东夫妇。金城的大厦上弹痕累累，旭东先生似乎一夜没有安睡，但他见了我很兴奋地说：“看到你的社评很得体，很有中国人的气概。”又说：“我昨晚听了一夜炮声，很高兴，了解到日军炸弹的爆炸力很有限，可见它的炸药制造并不怎么先进，我们再努一把力，完全有可能追过它。”我听了这段话，由衷地发生一股敬意。在这炮火纷飞中，他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还一心想着如何发展中国的化学工业。他说这番话时，这么自然，这么安详。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深深地使我感动。

我们一起吃了早餐后，旭东先生特地邀我到他的房里闲谈。他侃侃而谈了他对“立国大本”的看法。

他说：“立国于现代的世界，主要要在科学、文化各方面打下现代化的坚实基础。政治制度和政治风气是重要的，但比之

前者，没有决定的意义。比如，你们能把《大公报》办成一张真正反映民意、敢言而伸张正义的报纸，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尊重，那就在舆论界立下了一根坚实的柱子。再如，我们在化学工业方面，力求进步，产品在国际上列入先进的行列，那就在这方面也立了一根坚实的柱子。中国有这样几十根柱子，基础就牢固了。政府好比是一个屋顶，好的屋顶会在这些柱子上牢牢建立、铺盖上去；不好的，它自然安放不住，会垮下来，要重新修造，但不会影响下面的柱子。有了这些柱子，终有一天，会盖好一幢举世瞩目的堂皇大厦。”这些议论，现在看来，自然还不脱他一贯的“科学救国”的窠臼。当时我却受到很大的感动和鼓舞。

（三）

不久，香港总督终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炮火停了，日军蜂拥进了香港，而且到处搜查，发生了好几起抢劫和奸淫事件。皇后大道和德辅道等处，到处由“烂仔”——流氓摆设了赌摊和打劫来的旧货摊。一些与中国政府有关的知名人士，如颜惠庆、陈友仁等等，被拘押起来，先集中在九龙的半岛酒家，过几天又移押香港大酒店。周作民也在被拘押之列。胡政之则早已躲藏在铜锣湾的一位同乡家里。范旭东还安居在金城银行，日军当局没有发现这个干瘦老头儿是中国化工界的重要人物，因此得到幸免。也有甘心自投罗网的，有一位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的桂系政客甘某，本不在日军预定搜捕之列，他特地在寓所门前贴出一张醒目的条子“前国府外交次长甘某某之寓”，自然也被“请”去香港大酒店作了“座上客”了。

原来被人不齿的几张汉奸报，特别是汪精卫系主办的《南华日报》，日军侵占香港的第二天就加张大事宣传“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还发表了南京伪政府《告港九同胞

书》，要大家“各安生业”，与“皇军”合作。它还雇了许多流氓、小贩到处送卖。过了两三天，几家当地老牌报纸也一一复刊。“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我只在半山宿舍里躲了三天，下山去“行街”一次，真是“举目有山河之异”。最使我骇异的，是平时也曾激烈地写过一些抗日文章的人，有些还是我认识的报界“名人”，都已在袖子上套上“皇军报道部”的袖章，昂然在人丛中穿行。那时，市上的电车、公共汽车及人力车都已停驶，海面上只有日军的小轮船往来穿行，并搜捕、射击偷渡的小船。我看到这种混乱情况，只匆匆走了一小时许，连忙回到宿舍。

那天傍晚，和经理金诚夫兄，步行去铜锣湾看望胡政之。他说，已雇好了一条小船，由妥人带领，准备第二天黎明前即出发去广州湾（今湛江市），问道回桂林。因为晚上要戒严，而且天黑了有“烂仔”到处抢劫。匆匆谈了几句话，向他珍重道别，我们又混在人丛中步行回到罗便臣道宿舍。

当天晚上，我正在开始“说书”，宿舍里几家同事的大嫂和孩子们，还有几位同事，忙着把我的房间拉紧黑色窗帘——为了防空，点上蜡烛——电灯已不亮了，围坐四周，听我从多年在上海评弹中听来的故事，如《英烈传》、《珍珠塔》等等，以冲淡四周袭来的恐怖气氛。忽然听到楼下捶门声大作，我们连忙把“临时书场”解散，各归自己的房中。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就冲上来四个端着枪的日兵，后面还跟着三五个便衣短装的汉子，有的握手枪，有的执短棍，先到各房间巡视搜查一遍，问哪个是房主？金诚夫兄出面应付，说明是报馆的职工宿舍。为首的一个日兵叽里咕噜几声，又去厨房里搜查一会儿就下楼出门去了。

第二天，大约上午八点半钟，又闯来了两个日兵，看样子地位比昨天的高一些，象是军曹、尉官之流，还带来一个翻译，指名要见我和金诚夫，说多田报道部长约我们去谈话。不由分说，

一人“伴”着一个走下楼，一辆吉普车已停在门前。上车后即开到山下，停在皇后大道上的娱乐戏院门前，原来，这里已作为“驻屯军报道部”了。他们把我们带上二楼的一个大客厅，已经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坐在一张长方桌的一端，三十岁上下的年纪，戴着一副眼镜，照例留着两撇“仁丹”胡子，见着我们，似站非站地向我们狞笑一声：“你两位是《大公报》的？”以手示意，让我们分坐在他的两旁。一位陪同的尉官之类，会说中国话，担任翻译，他先介绍说：“这位是多田部长阁下”，然后向多田说了我们的姓名。

多田先开口：“今天请两位来，商量如何尽快使《大公报》复刊。”

我说：“《大公报》的态度，你是知道的，今天怎么能复刊呢？”

“《大公报》过去对我国很不友好。现在‘皇军’已发动了‘圣战’，我们不咎既往，希望你们改变态度，支持‘大东亚新秩序’，我们就成为朋友了。”

“香港不是已恢复不少报纸了么？何必还要《大公报》复刊？”

“它们的作用小小的，《大公报》有国际影响。如果两位能和我们合作，可以把报办得更好，我们还可向大陆各处及日本、南洋推销，你们的销路就更大。”

“这次战争发生后，我们就估计今后不可能在香港再出版，所以早把全部职工遣散了。前几天，九龙仓中弹起火，大概我们的存纸也烧光了，其势没法复刊。”

金诚夫兄也补充说：“我们的资金也在遣散职工中几乎全用光了。”

多田装出微笑说：“只要两位肯合作，这些事全好办。钱、白报纸以及一切器材，我们可负责供应。要吃多少白米，你们造